

分类号	
著者号	
登录号	34393

碑 林

集 刊

(四)

1996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德国总统赫尔左科来西安碑林博物馆参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于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参观西安碑林。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西安碑林召开“西安碑林发展规划研讨会”。



(本页摄影:罗忠民、罗小幸)

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明清墨迹珍品

清·黄慎(1687—1768后)

写意石榴小品



清·梁启超
(1873—1929)

对联

明·董其昌
(1555—1636)

山水立轴

敬天罔豫视民如伤

壬戌七月 梁启超

受人以虚行己有耻

焕章将军吾兄



目 录

论文物在陕西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李炳武(1)

●碑林史话

清代西安碑林、文庙和府县三学整修概述 路 远(9)

抗战中北平鸿兴公司整修碑林偷工减料案始末 罗宏才(19)

略述西安碑林藏有关“新城小碑林”

 的三通碑石 田福宝 张蒙滋(44)

宋哲元与新城小碑林之创设 杨 娟(49)

碑林出土明代琉璃建材与嘉靖年间

 对西安府文庙之修建 杜 文(51)

●碑志考释

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 牛致功(57)

长安发现北魏献文皇帝之孙墓志 祥 生(62)

读唐墓志丛劄 贺忠辉(64)

《唐阎庄墓志》注 郭子直(79)

新出唐刘僧墓志考释 王翰章 尹夏清(87)

《唐大智禅师碑》考释 张伯龄(93)

《唐豆卢建墓志》考 罗宁丽(104)

慧坚禅师碑考述 张 岩(106)

新出唐青州户曹参军韦挺及夫人柏氏墓志

 所反映出的几个问题 王 勇(112)

读《杨玄略墓志》 贺 华(115)

《古柏行》碑小考 杨智忠(119)

●碑帖咀华

《九成宫》碑之传世善拓及其临摹本述略

——兼评任步武先生临制之《九成宫》碑 王其祎(121)

西安碑林藏两种宋拓本述要 李雪芳(130)

●碑志评析

- 碑志集评 高 峡(133)
《唐宗圣观记碑》漫谈 张 云(152)
唐《张涣墓志》浅说 倪丽烨(153)
宋《大观圣作之碑》评析 李 娜(155)
《华藏庄严世界海图》概说 姚春喜(157)
五岳真形图碑 黄小芸(159)

●石刻艺术

辉煌而沉重的步履

——对中国古代雕塑的反思(一) 王 蓓(162)

●书艺漫笔

三论书法在中国艺术中的美学地位 张建华(166)

●文史研究

- 西安碑林藏《长安志图》手抄本 陈财经(177)
《昭陵碑录》与初唐政治制度 焦 杰(180)
道因法师其人其事 董玉芬(185)
中国古代《汉书》研究概述 徐家骥(189)

●异邦掠影

访日见闻 罗忠民(196)

●贞石沧桑

- 新疆汉碑述略 李举纲 樊 波(200)
郭沫若题太史公墓诗碑由来和遭遇 王军鼎(206)

●文物丛谈

唐鉴若止水铜镜 刘向阳(208)

●博物馆学

对西安碑林环境风貌保护的思考 苗向阳(210)

谈博物馆的安全保卫工作 宋俊科(216)

●碑林学人

武伯纶先生年表简编 陈根远(220)

●诗词咏胜

宋伯鲁(232) 朱 德(232) 肖 华(232) 汪 锋(232)

田 汉(232) 冯友兰(233) 冯其庸(233) 吕剑人(233)

吕效祖(233) 刘逸生(233) 杨鸿章(233) 李炳武(234)

张文立(236) 成建正(237) 高 峡(237) 徐志诚(240)

王 安(241) 王其祎(241)

●新书介绍

《鸳鸯七志斋藏石》 冯慧福(8)

《法门寺佛教文化奇迹》 何东培(18)

《三秦碑刻英华》 田福宝(188)

《石版文章——历代碑刻琐谈》 王 泊(199)

●消息

刘郛墓碑在山东安丘发现 张 云(215)

●补白

总论唐人书 叶昌炽(42)

论文物在陕西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李炳武

文物是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以及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代表性实物或遗存。文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无可替代的实物见证。中国的文物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它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科学研究、在认识和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发展旅游事业促进同世界人民的交流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享誉天下的文物旅游胜地。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古朴浓厚的民风民俗,旖旎秀美的自然风光,为中外游客提供了一片古老神秘且新奇有趣的文物旅游天地。

陕西正是这块旅游天地中最古老神奇令人向往的好去处,正如游客们所说:“你了解中国十年来的发展变化,请到深圳去;你了解中国一百年的历史,请到上海去;你了解中国一千年的历史,请到北京去;你了解中国六千年的历史,请到陕西去。”“不到陕西,等于没来中国”。

陕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早在 110 多万年前,蓝田猿人就生息繁衍在这里,距今 6000 多年前,生活在西安浐河边的半坡人就建造并遗留下了一个典型、完整的母系氏族原始部落;5000 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就安葬在黄陵县桥山之上。从公元前 11 世纪到 10 世纪初,陕西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强大的汉、唐帝国的中心。近代陕西又是中国革命的摇篮,1935 年至 1948 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并以此为根据地,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陕西省会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国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北京)中建都时代最早、朝代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城市。并与开罗、雅典、罗马齐名,称为“世界四大古都”。其中建都西安并号令天下的周、秦、汉、隋、唐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最为辉煌的时代,这里创立的周礼、秦制垂数千年而弗能改;这里兴起的汉风唐韵远播四海,影响世界。唐末政治中心东移以后,西安仍为西北重镇。蒙元的安西王宫、明朝的秦王府、清代的陕甘总督行署都设在这里。长安又是著名“丝绸之路”的起点,闻名于世的徐福蓬莱求仙、张骞出使西域、唐僧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日本,皆由此出发。在封建社会时期直至今日,陕西一直是欧亚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陆桥梁。

陕西文物甲天下,是一处以人文景观而名于世的旅游胜地。漫步于三秦大地,到处可拜访名刹圣地,随地可欣赏奇珍异宝。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强大帝国的政治中心,生活并长眠于

此地的炎黄、秦帝、汉武、唐宗等 79 位封建帝王及成千上万的贤臣良相、勇士名将、才子佳人都留下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传说。灿烂悠久的历史，给方圆数百公里的地上地下留下了极其丰富、掘之不尽、观之不完的珍贵文物。

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人们对文化的需要也相应提高，文物所拥有的科学、艺术和历史等社会价值也日益被人们重视，其旅游、观赏等经济价值也不断地得到开发利用。

面对祖先留下的这片古老美丽的土地，陕西作为一个文物大省，如何借助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优势，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文化大省”向“旅游名省”的转变，如何定位文物在陕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实现观念上的转变，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发展陕西加快西部开发中必须解决的首要课题之一。本文试图针对文物在陕西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得到人们对文物事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一、文物是“陕西走向世界，世界了解陕西”的桥梁和窗口

昔日“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方商贾往来、文化交流的桥梁，玄奘取经、鉴真东渡成为世界宗教文化传播的佳话。今日享誉世界的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神奇的法门寺地宫又成为连结陕西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纽带。

还在秦俑博物馆筹建期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专程来到工地，当他看到为数不多的兵马俑后，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这是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1978年9月，法国总理希拉克看到尚未修复的陶俑，就连声称赞：“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了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从开馆至今已接待 80 多位国家总统和首脑，接待总理首相、部长级的贵宾一千多人次。著名的有美国前总统里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德国总理科尔、法国总统密特朗、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日本首相竹下登、法国总理希拉克等。正如新加坡《联合晚报》称：“兵马俑发现后，连访问北京的各国领导人或元首，都以前往西安参观兵马俑为一大乐事”。美国前总统卡特看了秦兵马俑后，兴奋地说：“西安之行是我在世界上最有意义的旅行之一”。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来到秦俑后感慨地说：“我搞了十几年的考古，也到过欧洲许多国家的考古工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这里的一切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自 1979 年到 1994 年，秦俑博物馆累计接待国外游人 2953646 人次，平均每年以两到三万人次递增。^①从 1980 年后，秦俑先后到美国、法国、联邦德国、丹麦、瑞士、意大利、瑞典、比利时、澳大利亚、日本、挪威、奥地利、英国、爱尔兰、加拿大、韩国、香港、台湾、澳门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展览，约接待观众 1500 多万人次。^②秦兵马俑成为陕西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使者。1983 年当秦兵马俑出现在日本时，预售的 100 万张门票迅速被抢购一空，观众猛增至 200 多万人。1984 年秦俑在瑞典首都斯德歌尔摩东方博物馆展出时，因为要求参观的观众太多，博物馆不得不打破惯例延长开馆时间。《瑞典日报》还风趣地写道：“中国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的部队出现在斯德歌尔摩，是瑞典人的骄傲”。瑞典国王和王后还专程为展览剪彩。秦俑在爱尔兰展出期间，热情的观众达 10 万人之多，占到了爱尔兰人数 3%，创造了爱尔兰展览史上最高的纪录。兵马俑在美国展出，更是轰动全美，为此明尼苏达州特别举办了“陕西月”活动。秦兵马俑走到哪里，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就传播到哪里，陕西的名字就留在哪里。秦俑，这一独特的历史文物，架起

了陕西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开凿了世界人民了解陕西的窗口。

1987年4月2日,当隐秘千年的释迦牟尼佛指舍利及唐代诸帝为其安奉所赐珍宝在法门寺地宫被发现之后,海内外为之震惊,佛教世界一片沸腾,“佛骨旋风”波及宇内。1988年11月9日,举世瞩目、仅存于世、象征性大的佛指舍利瞻礼法会在法门寺隆重举行。法门寺与真身宝塔重建,法门寺博物馆新建落成和开放,迎来了数以万计的国内外人士,从此法门寺为世界人民所关心和注目,海内外文化人士、佛教人士纷纷前往,旅游观光者络绎不绝。法门寺的文物成为联结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崇拜佛教国家人民的又一文化纽带。法门寺地宫文物也相继出展国外,成为陕西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信鸽。

坐落于西安的半坡博物馆、碑林博物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以及延安革命纪念馆等都以其独特的文物内涵和时代精华蜚声中外,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所仰慕的地方,每年数以万计的各国友人络绎不绝前往参观访问。这些负载着中国民族文明历史的文物精华连同陕西的名称一起被列入了世界文明史的典章,以各种不同的文字、语言、影像走向世界各地,为世界人民所熟知。正是这种“走出去,请进来”树立起了陕西的形象,促进了陕西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

陕西文物的出土和展览,已成为陕西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纷至沓来的世界各国总统、总理、国王、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艺术家、文学家等各方名流人士,他们在陕西的出现,构成了陕西省对外政治活动中的主要内容。1986年,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站在雄伟壮阔的秦兵马俑军阵前时,她仿佛感到沉睡千年的中华民族已揭开了朦胧的面纱,沦落了近百年的英殖民地——香港该是回归其祖国的时候了!当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个个首脑人物站在秦兵马俑前发出啧啧称赞声的同时,他们也看到崛起的中华民族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民族,中国大地那满目沧桑、积贫积弱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这里的文物又担当起了国际间政治、外交等相互交流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成为国际间竞争的重要手段。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惊世的文物不光引来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家、领导者,也引来了无数的经济学家、文化名流、宗教人士、商业人士。这些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人士的涌入,给多少年来观念传统、思想陈旧、生活封闭的黄土人注入了活力,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方式的陕西人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开始从旧思想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学习和吸纳外来的各种优秀文化,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了解世界,走出家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陕西把发展的目标投向了更高处。以文物为依托发展旅游事业,筑巢引凤,改善旅游环境,让更多的外商认识陕西,了解陕西,进而投资于陕西。西安杨森制药厂、喜来登宾馆、凯悦宾馆等一大批三资企业、商贸公司就是这样落足于陕西的。自1978年开始,世界各国来陕旅游的人数由几十万人次持续增长到1995年的421万人次。外商投资企业由1983年的第一家增加到1994年的1884家。^③正是陕西富有的文物资源和丰厚的黄土文化才使众多外商看好陕西的旅游业,看好与陕西合作的前景。

可以说,文物在陕西的对外开放、政治活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发展经贸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和无法替代的作用。大量的世界各国友好人士来陕参观文物古迹,从事文化和思想交流,对陕西人转变观念解放思想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更是极其巨大,在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推动陕西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可以预见,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对文化需要的进一步提高,陕西的文物

将引来更多的世界各国观光者,招来更多的投资商,真正成为“让世界了解陕西,让陕西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窗口。

二、文物旅游是带动陕西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和支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陕西的文物事业蓬勃发展。“八五”期间全省累计投资 113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文物保护维修,新建各级各类博物馆、纪念馆 10 座,开发文物古迹旅游景点十余处。依托文物的旅游业、宾馆业、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文物旅游纪念品业等迅猛发展。从 1978 年到 1994 年,全省新增海外旅游公司二十多家,旅行社团近百家,兴建星级以上宾馆二十余座;开通了西临、西宝高速公路和十多条旅游热线;餐饮服务和文物旅游纪念品从业人数约增到 370 万人。^⑤华山、骊山、乾陵、法门寺等著名旅游区附近的乡镇和农民围绕文物旅游大作文章,涌现出了一批旅游专业户、专业村,建起了许多文物旅游纪念品生产厂。全省形成了门类齐全服务一体化的庞大第三产业队伍。

“八五”期间,陕西省各级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及文物保护单位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约 5000 万人次,其中外宾 200 多万人次,全省博物馆累计门票收入约 2 亿元。^⑥依托文物的旅游业,从 1978 年到 1995 年,全省累计接待海外旅游者 421 万人次,国内旅游者 2.35 亿人次;旅游外汇收入 7.83 亿美元,回笼货币 100 余亿元。^⑦全省 1993 年文物门票收入 5826 万元,旅游外汇收入 50034 万元外汇人民币,国内旅游收入约 25 亿元人民币,全省第三产业收入 233.48 亿元,文物和旅游总收入约占全省第三产业收入的 13%;1994 年全省文物门票收入 7000 万元,旅游外汇收入 94920 万元外汇人民币,国内旅游收入约 30 亿元人民币,全省第三产业总收入 298.66 亿元,文物和旅游总收入约占全省第三产业收入的 17%;1995 年,全省文物门票收入 9161 万元,旅游外汇收入 1.39 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约 42 亿元人民币;1996 年,全省旅游收入突破 77 亿元人民币。^⑧同时,近几年来,陕西的文物对外展览及文物复制品销售也进一步加强,有望开出一条增加经济收入的新渠道。文物旅游业在陕西第三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已成为第三产业中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果说文物旅游收入是文物最直接的经济收入的话,那么与文物密切相关的交通、邮电、民航、宾馆业自 1978 年以来,也有了较大地发展。陕西第一条高速公路,西临高速公路就是新加坡总统李光耀参观完兵马俑之后提出修建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投建也是适应陕西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建设的。

在陕西这块广袤的黄土地上,文物景点出现在哪里,宾馆服务、旅游社团、交通运输、邮电、银行等配套服务业就扎根在哪里,延伸到哪里,新的旅游热线就出现在哪里,公路的等级也就首先在那里得到相应提高。秦始皇兵马俑、法门寺地宫的发现就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

十几年前秦陵的周围还是一片荒芜,当地的农民以农为业,靠天吃饭,挣扎在温饱线上。秦兵马俑博物馆建成之后,不仅周围建起了一座座宾馆,修起了高速公路和旅游专线,接通了电话线路,而且迎来了世界各国游人,祖祖辈辈守在黄土地上的农民们开始也学起了“洋文”,挣起了“洋钱”,盖起了“洋楼”。他们在高兴之余,常常在自家大门上挂起“幸福不忘共产党,致富感谢始皇帝”一类楹联。可见秦兵马俑的发现,不仅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各个行业,而且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1987 年,法门寺地宫宝藏揭密之后,不仅旅游、宾馆在其周围迅速兴起,而且连接西安

和法门寺、宝鸡和法门寺的交通运输建设也迅即得到了发展,公路等级不断提高。邮电通讯、餐饮服务、商业网点等行业也在其周围得到了发展。法门镇也迅速扩大,乡镇企业也异军突起,由外商投资的法门佛教文化城等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加紧实施。

可以说,哪里有文物,哪里就有游人,哪里就有宾馆,哪里就有公路,哪里就有新的资金投入与产出,哪里的人们就先富起来。正如程安东省长所讲:“没有文物就没有陕西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就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局面”,“没有文物就没有外商来陕投资建设宾馆,没有文物,世界银行和其他国家就不会贷款投资这几条高速公路和咸阳国际机场”。

除上述与文物密切关联的产业外,还有餐饮服务、文物复仿制品、旅游纪念品、图书影视文化艺术等行业,可以说,它们是延伸的或间接的与文物相关联的行业。这些行业一方面吸纳了数以千万计的社会劳动人员,另一方面也成为城乡人民经济收入来源的一部分,创造了大量的经济财富。

据统计,这些围绕文物以及文物旅游发展起来的不同行业已涉及第三产业 12 个大门类中的 6 个门类以上,产值约占到全省第三产业总收入的 70% 左右。^⑥成为陕西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和支柱。

从陕西省统计局和陕西省计委统计资料看,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第三产业平均发展速度超过第一、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由 1978 年的 17.6% 上升到 1995 年的 35.7%,提高了 18 个百分点,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由 1990 年的 25.7 : 38.4 : 38.8,调整为 1995 年的 20 : 44 : 35.7,形成了二、三、一产业结构顺序。从全国第三产业规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看,到 2010 年,三产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 40% 左右,三产的比重有可能超过一、二产业,跃居第一位。因此,发展陕西的文物旅游事业,带动第三产业快速增长将是陕西今后一段时间内发展经济,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一个有效途径。

以上是从宏观的经济指标和整体的产业结构方面对陕西文物及其关联产业运行情况和地位进行的粗略分析。

从微观的个体的博物馆经济运行状况看,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为例。建馆十五年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累计接待海内外参观者 3000 多万人次,固定资产已增至近两亿元。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建成之后,掀起了世界性“秦俑热”。陕西境内的旅游社团迅猛增加,全省一、二类社由 1978 年的 3 家增加到 1994 年的 30 家,三类社增加近百家。许多省外国外的一些旅行社也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建立起了友好关系,以秦俑为依托发展旅游事业。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参观秦始皇兵马俑馆后说道:“中国要修高速公路,第一条应修在西安至临潼”。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陕西省投资 2.4 亿元利用这条旅游热线建起了长 23.88 公里的西安至临潼全封闭高等级公路。西临高速公路的开通,不仅改善了原有的旅游交通环境,而且促进了西安和渭南两地区的经济发展,西临高速公路开通仅一年半,累计获使用经济效益达 24044768 元,节约燃油 1887.6 吨。^⑦围绕秦俑的商业网点、通讯设施、宾馆餐馆、文物复仿制品开发等各个行业也迅速兴起,而且经久不衰。文物旅游的龙头作用和经济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由以上可以看出,文物在陕西经济中已成为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和支柱。从长远的发展看,陕西文物资源的潜力还相当巨大,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印证,陕西境内的帝王陵达 79 座,现开发利用的仅 9 座,仅占其总数的 11% 左右。如果将这 79 座帝王陵都开发利用,可以想象,陕西的文物旅游收入,第三产业收入,乃至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将会有有一个极大地飞

跃,陕西的经济将摆脱落后,走出贫困。

三、文物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和重要基地

文物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它作为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反映了民族发展历史的轨迹。对于每个国家来说,文物是国家历史的见证,是民族尊严的体现。它对增强本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唤起全民族的爱国热情,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有着广泛的宣传教育作用,也是人类研究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资料。

陕西的文物无论时代的完整性还是其内容的涵概范围,可以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从远古人类的活动遗迹,到古代、近现代,既有文化、艺术、史地、科学、医学、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内容,又有经贸、交通、农牧业、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依照文物的时代或内容建成的历史博物馆、民俗文化博物馆、地质矿藏博物馆、遗址博物馆等各类博物馆达70余座。利用这些文物和博物馆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文化精华,进行科学技术知识教育,陕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第一,文物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有规律的客观过程。利用陕西境内的“蓝田猿人”、“半坡母系氏族遗址”、“秦兵马俑”以及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的科技、文化、军事等优秀成果,对青少年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使他们在实物的直观感受中懂得“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从历代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农民战争史中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确立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从人民群众创造出的灿烂文化和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参观学习中,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运用文物这一历史载体来研究人类社会,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和一切传道士的根本之处,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途径。

第二,文物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爱国须先知国,爱国主义经过五千年的漫长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就是进行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而历史文物在这一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在陕西有全国最现代化的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革命圣地——延安;在中国历代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实物遗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创业史;有记载着千百年来各种文化传播、商贸往来的大小雁塔、法门寺、丝绸之路等历史遗物和遗迹;也有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者入侵的“西安事变”、八路军办事处等纪念馆。充分发挥每一件文物、每一处古迹、每一座博物馆的作用,以各种形式的文物展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使每一位观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增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感情,从而振奋精神,焕发起热爱祖国,热爱陕西,热爱家乡的激情。通过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艺术熏陶,激发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强国更加奋发努力。

目前,陕西省已有40余座博物馆、纪念馆被省、地(市)、县(区)确定为“社会教育基地”或“校外德育基地”,与1500余所学校、近200家厂矿部队正式签定了教育基地协议书和共建协议书。“八五”期间全省博物馆共接待中外观众5000多万人次,其中免费和优惠接待大、中、小学生500多万人次。文物成为当代青少年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第三,文物是进行科学知识教育的珍贵资料。

陕西的文物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涵丰富。在这些众多的文物中又包涵了极其广泛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在半坡博物馆,就有我们的祖先运用物理学知识、数学知识创造的尖底锥形瓶,利用火烧制的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人类早期的住宅建筑等,在这个遗址博物馆里,有人类早期创造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有人类从事种植业、养畜业的文物见证,也有人们对水、对火、对周围自然资源创造性利用的痕迹,其中许多方面都开创了人类科学技术领域的先河。著名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不仅有庞大的、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堪称世界雕塑杰作的秦兵马俑,而且有运用冶金、铸造、机械加工等技术于一体的秦铜车马,有反映古代战争的兵阵,也有反映人类交通工具发展的骑兵、车兵等。在秦兵马俑博物馆里充分展现了军事、交通、雕塑、冶金、铸造、机械加工、天文地理、建筑等多行业的技术运用。尤其在铜车马制作中,如何把金银两种熔点不同的金属恰当地连接起来,至今仍然是冶金史上的一个科技之谜。

陕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以及后来的唐三彩、玉器、瓷器、金银器等各类生活用品,祭祀器物、战争器械、生产工具等,都包涵了许许多多物理、化学、数学等知识,包涵了冶金铸造、建筑工艺等多学科技术知识。许多寺庙塔林、宫殿城池等都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运用科学知识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建筑,树起了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座座丰碑。古长空栈道、大小雁塔、阿房宫、长安城等,在中国的建筑史上都有着其特殊的科学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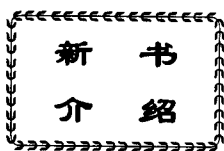
其次,还有如唐墓壁画、古编钟、丝绸、印刷、造纸、天象观测、古代典籍、古动植物化石、民俗民风、地矿、建筑材料等文物古迹、古建筑、遗址,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绘画艺术、音乐、纺织、印刷、天文、人类学、地质学、建筑学、医学等科学领域奋斗的结果,反映了他们为人类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陕西兴建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耀州窑博物馆”、“洛川民俗博物馆”、“药王山博物馆”、“陕西地质博物馆”、“西北农大昆虫博物馆”等,都以其鲜明的特点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在与自然斗争中,发展科学技术,攀登科学高峰的斗争历史。因此,陕西的文物又是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珍贵资料,也是激发青少年一代努力学习,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良好教育场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

综合以上文物在陕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纵观当今国际国内形势,世界各国人民都以争取和平为己任,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现代交通、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已将世界各国人民联结在一起,时空界限大大缩小,人类追求文化,了解世界风貌已成为可能,环球性的旅游事业也出现了二战以来的高峰,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化阶段,把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步向中西部转移这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陕西地处内陆、亚欧大陆桥横贯其中,文物资源得天独厚,可以说把握这一难得的时代机遇,依托文物发展陕西的旅游事业,带动第三产业兴盛,培植壮大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陕西整体经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必然,也是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变文化大省为旅游名省”的必然。因此,重视文物,保护文物,合理利用文物,变粗放型管理为集约化管理,走联合发展的路子,已成为我们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改善陕西旅游环境,推动陕西旅游事业发展的根本,是陕西经济走出困境的一条必由之路。

注释:

- ①参见秦俑博物馆历年参观人数统计表
- ②参见秦俑博物馆出国外展统计表
- ③参见陕西省经贸委《陕西省外商投资企业现状》
- ④据省旅游局和省计委有关统计数据
- ⑤据省文物局有关统计数据
- ⑥据省旅游局统计资料
- ⑦据省文物局、省旅游局统计资料
- ⑧参见陕西省 1995 年计划会议第三产业“九五”计划和 2010 年发展规划设想有关数据
- ⑨参见《陕西省高等级公路建设经验与论文集》



《鸳鸯七志斋藏石》

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 赵力光著

三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1/8 开本,85 千字,图 318 帧,精装,第一次印数 2000 册,定价 198 元。

《鸳鸯七志斋藏石》是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吴钢主编的《陕西金石文献汇集》丛书之一,该书由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赵力光编辑,由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题签。该书的出版曾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及社会有关人士的大力襄助。

《鸳鸯七志斋藏石》是我国民主革命先驱、著名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民国时期搜集的汉代至宋代墓志、石刻计 318 种 387 石(包括墓志盖)的总称。其中大多数是北朝墓志,而所谓鸳鸯七志又是因为其中藏有七对夫妻墓志得名,它们是:《穆亮及妻尉太妃墓志》、《元遥及妻梁氏墓志》、《元斑及妻穆玉容墓志》、《元谭及妻司马氏墓志》、《元诱及妻薛伯徽墓志》(或《元诱命妇冯氏墓志》)、《元鉴及妻吐谷浑墓志》、《赫连子悦及妻闾炫墓志》。

《鸳鸯七志斋藏石》的价值,向为海内外人士所推重。用于右任先生的话说就是:“每览志文,于征伐官制诸端,可补前史疏漏;于氏族之可考南北播迁之原委;于文辞可增补骈散之别录;于书法可知隶楷递变途经,学者寻绎史材,且不止此,亦治文史者之一助也。”

《鸳鸯七志斋藏石》自 1935 年捐藏西安碑林后,迄未结集刊布,因而此次出版不仅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右任先生也是一份良好的纪念。

(冯慧福)

● 碑林史话

清代西安碑林、文庙和府县三学整修概述

路 远

清代是西安碑林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就像碑林的形成与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不无关系一样,清代碑林的发展,也与当时金石学之大盛有关。清代之前,碑林的整修往往是文庙、府学整修的一部分,而从清代开始,对碑林、文庙和府县三学的整修一般都是分开进行。整修文庙和府学,似乎是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的专利,咸宁、长安二县学的整修则由二县长吏主之。碑林已不仅仅是文庙、府学的附属,而是愈来愈具有独立性,单独进行整修,专门立碑记事。由于整修是分别进行的,所以次数就多,清代267年间对碑林、文庙和府县三学的整修有文字可考的共14次,其中4次专门整修碑林。这些整修大都立有记事碑,但有关文庙和府县三学者有的已佚,只在方志资料中留有简略的记载,其未佚者,也在1953年被原陕西省博物馆掩埋于碑林院内,好在有拓本资料留存。目前仍陈列于碑林者,是整修碑林的3块记事碑。本文即根据这些碑刻(或拓本)和方志资料,参考其他历史文献,对清代西安碑林、文庙和府县三学的整修情况作一个概要的回顾。

一、顺治年间的整修

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十二日,清军攻占潼关。十三日,李自成“遂弃西安,由龙驹寨走武功,入襄阳,复走武昌。”^①十八日,清军占领西安。到当年二月,陕西全境已为清军控制。顺治朝18年,基本上是在对南明势力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余部的战争中度过的。顺治之初,清朝在陕西的统治亦险象环生。就在顺治二年十二月,原李自成部将、后诈降满清的贺珍在汉中重举义旗,出连云栈,攻占凤翔,一时关中各州县纷纷响应,引发了席卷陕甘的抗清高潮。十二月下旬,贺珍部联合孙守法等关中义军围攻西安城,被镇守西安的清川陕三边总督孟乔芳击败。然而,就在顺治朝这并不太平的18年间,西安文庙和府县三学竟有过6次整修。虽然规模都不算大,且有地方官借此猎取崇儒虚名之嫌,但从这一个个小小的局部仍可看出,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在镇压汉族民众反抗的同时,极力争取和笼络汉族士大夫,为巩固其统治网罗人才。

1. 顺治三年(1646年)重修庙学

这次整修是在清军占领西安的第二年,亦即孟乔芳出退贺珍围城后不久。其主要资料是同年所立《重修庙学记》碑,杨墩撰文,邵震元篆额,华开先书。碑文对整修本身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说当时的陕西巡抚雷兴,于顺治三年二月(“丙戌仲春”)在文庙参加释奠礼时,“目睹咨嗟,慨志修饬”,并“捐俸伍拾金为诸僚倡”,结果筹得“数百金”。杨墩受命具体负责

工程，“作之平之，既涂既屢，筮豆簠簋，修其残缺，管籥笙簧，考其遗亡，庙貌改观，芹藻壮丽，而西安之学遂焕然聿新矣。”碑文未说明工程的起止时间，不过文末所署立碑时间为“顺治三年岁次丙戌黄钟月吉旦”，所谓“黄钟月”，指仲冬之月，即阴历十一月，可知此役当在顺治三年雷兴参加释奠礼的仲春二月至仲冬十一月之间进行，时间不会太长。整修的范围，碑题称“重修庙学”，但从碑文内容看，主要是文庙，也可能涉及府学，因碑文表述太略，难知其详。而且署名官员既有总督孟乔芳，巡抚雷兴，也有西安知府，咸宁、长安知县及府学、二县学教官，那么文庙、府县三学一并整修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不过碑文只字未提碑林，似不在整修范围之内。可恰好就在此次整修的顺治三年，费甲铸以兰州肃府本重刻《淳化阁帖》，立于西安碑林，共计143石。这是清代对西安碑林的重要贡献之一。这样一部大型刻帖立于碑林，肯定会覆以保护性建筑，可能还会因此对碑林原有格局加以改动。问题是，无法确定刻立《淳化阁帖》之举与当年进行的整修之间的关系，如果它是此次整修的组成部分，那碑林就应在整修范围之内。

碑文中提到的孟乔芳，字心亭，直隶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人，是清朝开国时期功绩显赫的人物。清军入关前便已投靠皇太极，顺治二年四月起任陕西三边总督，平定四川后，又兼督四川，称陕川总督。他治陕9年，平定各种反清势力，在地方上实现了初步的安定^②。倡修者雷兴，汉军正黄族人，是清朝的第一任陕西巡抚，任职至顺治四年^③。

2. 顺治六年(1649年)重修文庙

记载这次整修的是顺治七年《重修文庙碑记》。此碑霍达撰文，费甲铸书，王乃牧篆额。从碑文看，这次修的只是文庙。碑文写道：“大总制孟公乔芳，大司农王公朱用，大中丞黄公尔性，三公祖秉钺督镇，忠君爱民，劳瘁悉备，狐举潜消，士民安堵者。顺治己丑，总制孟公祖□出督师，二公长至日拜庙，阅殿楹、两庑、泮水、宫墙渐为倾圮，怆然兴怀，各捐俸五十金，命西安府广文杨先春董葺。损者易栋，缺者增补，风雨妬蚀者妆颜。”3年前刚刚修过，文庙建筑的老化也未免太快了，才3年时间竟又破败倾圮得让新任巡抚“怆然兴怀”了。从所耗资金看，只提到王、黄二人“各捐俸五十金”，所用时间，则碑文称“三越月而事竣”，可见工程量并不大。可以说，这是在顺治三年整修庙学的基础上，对文庙又重加粉饰，因前任巡抚雷兴已调任，新任巡抚黄尔性大概也想在自己任上留下一个捐俸修庙的好名声，于是稍加修葺，便立碑记事。明清两代，这种情况颇多，虽则无聊，但在客观上对保护文化遗产无疑是有好处的。此黄尔性，辽东盖州（今辽宁盖县）人，他是顺治四年接替雷兴出任陕西巡抚的^④。

3. 顺治八年(1651年)重修长安县学

有关此次整修的资料出自地方志。雍正本《陕西通志·学校志》“长安县学”条下记曰：“本朝顺治八年，知县樊鸿选、训导张宏业重修有记。”嘉庆本《长安县志·学校志》“县学”条下则记有：“顺治八年，知县樊宏、训导张宏业重修。泮池旧在大门外，顺治八年训导张宏业改凿于仪门内。”“春风化雨坊在泮池上，顺治八年训导张宏业建。”两志所记的知县不同，查嘉庆本《长安县志·职官表》，樊鸿选是顺治四至八年任知县，樊宏是顺治八至十二年任知县，重修县学的顺治八年，恰好是他们交接之年，二人都可能正在任上，不知两志哪个记载正确，也许二人都参与了县学的重修，训导张宏业则是整修工程的具体负责人。关于整修内容，志书只提到县学内改凿泮池和修建“春风化雨”坊，因记事碑亡佚，详情无从知晓。

4. 顺治十年(1653年)重修西安府学

雍正本《陕西通志·学校志》“西安府学”条下记有：“本朝顺治十年，提学田厥茂重修有

记。”乾隆本《西安府志·学校志》“府学”条下亦记曰：“顺治十年，提学使田厥茂即明代旧址增建。”据此我们只能知道，顺治十年曾有过一次重修西安府学之举，而且是在明代原有基础上“增建”，并立有记事碑，可惜此碑不知所终。此田厥茂，字心耕，蒲城人，顺治三年进士，顺治七年督学陕西，颇有政绩，后升任福建布政使^⑤。他所主持的重修府学，虽然记事碑已不存，具体情况不明，但很可能是清代初年对府学的一次实质性的整修。

5. 顺治十一至十二年(1654—1655年)重修咸宁县学

嘉庆本《咸宁县志·学校志》“县学”条载：“皇清顺治十二年，邑令昆山余国柱捐俸庀材，绅衿各输赏助工，而堂序为之一新。邑人韩文镜有记。”其后录有韩文镜碑文。文曰：“昆山余公来至吾邑，……见桥门颓圯，公毅然曰：是予任也。……遂倡议修葺，聚材鳩工，为费不貲，皆出公俸，余佐政诸君及广文先生，亦莫不同心勩成。飭旧补漏，古初雄丽之观于焉复睹。”关于整修的时间，文中说：“工兴于甲午之夏，告竣于乙未之春，”即从顺治十一年夏到十二年春，历时近一年。仅从工期看，这次重修规模大概不小。可惜碑文所记太略，未涉及整修的具体项目。雍正本《陕西通志·学校志》也记载了这次整修。

6. 顺治十七年(1660年)重修文庙

这已是顺治年间第三次整修文庙了，倡修者是当时刚上任的陕西巡抚张璠。此公倒也厚道，修完后并未立碑，是康熙四年(1665年)其继任者贾汉复立碑追记的。贾汉复所撰《重修西安府文庙记》碑文称：“癸甲之交，城既破甑，庙□□草。伪逆□之，先师九天之鉴弗歆，其牢礼嗣？人民狼狽，衿佩流离。虽幸鼎初底定，财用匱拙，抚兹土者不忍以土木役众。迨三韩张大中丞，乃倡捐输而为之。……工成于顺治庚子秋，未有记。雍人士唸于予，求载事以纪其功，并告将来，乃仰为记之。”碑文对整修本身未作具体记述。这位整修后未树碑留名的张璠，字伯珩，阳城(今山西阳城县)人。他是顺治十七年四月接任陕西巡抚的^⑥，而工程完成于“顺治庚子秋”，即当年秋天，也就是说，从他上任到完工，总共才四五个月时间，而用于整修的时间当然就更少，所以工程量不会太大。碑文中提到了碑林：“石经□萃，遗文炳蔚”，但未说是否一并整修。

总之，顺治一朝 18 年间，西安文庙、府学及咸宁、长安二县学都经过了整修，文庙还修了 3 次。满清统治者入关后尊孔崇儒的积极性由此可见一斑。顺治年间碑林是否也整修过，缺乏资料，无从稽考。想必在督抚之类大员出面整修文庙、府学时，应附带加以粉饰，但没有证据，不能确断。

二、康熙年间的整修

康熙皇帝是清代最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时间也最长，达 61 年。他亲政后，对内平定了三藩叛乱，对外扩张大片疆土，使满清王朝终于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中国社会由此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康熙朝 60 年间，重修西安碑林 1 次，文庙 1 次，另外咸宁县学也有 2 次修葺。

1. 康熙十年(1671年)重修文庙

这次整修文庙的资料，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修文庙记碑》，钟朗撰文，晋文煜、张鹏集唐石经书并篆额。碑文记述了康熙九年鄂善出任陕西巡抚后，“下车谒至圣庙，趋进伏墀，行礼毕，环顾而叹：栋摧檐剥若斯乎，椳损甃圯若斯乎，丹壁琉璃毁败黯澹若斯乎，何以安